

新編
圖書情報學
辭典

學苑出版社

新编图书情报学辞典

主 编 张玉钟 刘学丰 陈瑞玲 马玉英

副主编 周国田 张朝清 张国治 赵国军

学 苑 出 版 社

1989 · 北 京

新编图书情报学辞典

主编 张玉钟 刘学丰 陈瑞玲 马玉英

责任编辑:王敬业

护封设计:刘冬晖

封面、装帧设计:刘朝晖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市西四颁赏胡同四号

东北师范大学校办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1989年12月第1版

印张:26.875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715千字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80060—520—5/Z·46 定价:19.80元

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的

新知宝库

—序 言—

金恩晖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编纂和出版工具书的传统。

工具书是把内容广泛的知识领域或某一学科、某一专题范围的知识材料，按照特定方式编排以备检索、查阅的书籍。与普通图书比较，工具书知识覆盖面宽、内容概括、编排特殊，具有全面性、概述性、易检性和查考性等特点。它将普通图书中的知识内容进行筛选、加工和整理，形成条理化的知识系统，完整地、科学地，并且具有相当权威性地存贮文献线索，以便在读者需要时可以快速地提供具有某种特指性的情报信息和知识因子，对人生读书治学、教学和科学研究以及图书情报部门的参考咨询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工具书编纂与出版的质量和数量，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所制约，它的利用和传播也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水平，因为归根结底，它是一定社会文化积累的成熟程度及其社会成员的文明程度的标志。美国工具书专家肖尔斯说：“使用工具书的频率与某人的受教育程度成正比”（引自邵献图等著《西文工具书概论》第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讲的是很深刻的。

在我国，有的人将书目、索引、文摘等检索工具也从广

义的理解划入了工具书的范围，固然不无道理，但未必适宜；从读书治学者的习惯上说，人们一般所说的工具书系指字典、词典、类书、政书、百科全书、年鉴、手册、名录、表谱、图录等形式的图书。我国习惯上还将字典、词典、百科词典统称为辞书，而辞书是种类繁多的工具书中常见的、基本的、重要的形式。字典是将单字汇集在一起，按某种查字方法进行编排，用来解释字的形、音、义的工具书，它的作用是说明字的正确写法、标准读音以及它的意义和用法。词典又称辞典，是汇集语言和事物名称等词语、解释词义和用法，并按一定次序编排，以备检索的工具书。百科词典是百科全书与语言词典互相渗透的产物，但它解说简短，只作概括的解释，不象百科全书那样作系统阐述。

辞书最早起源于公元前7世纪时亚述文词表，我国见于著录最早的字典是《史籀篇》，相传为周宣王的太史籀所纂。公元前后，有关语言工具书性质的词典先后问世，在东方是中国汉代成书的第一部分类解释词语的词典《尔雅》，在西方是希腊的《词汇》。西方在中世纪才开始突破难词表的初级发展阶段，而中国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早就进行了系统地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等方面的工作。以后北宋陈彭年等编的《广韵》又成为我国现有以审音辨韵为主的最完整的一部韵书。《说文解字》、《尔雅》、《广韵》代表了中国古代主形、主义、主音三种辞书类型。后出的各种辞书均由这三种类型发展而来。这是按功能划分辞书类型的历史渊源。

按收录内容和范围来划分，辞书又可分为语言词典、专科词典和百科词典三种类型。专科词典是相对于综合性的、百科性的词典而言的，系指以某一知识领域、或某一学科、

某一专题范围为内容而编纂出版的词典。这是在图书馆中最常见、也最为读者所经常使用的一种重要的辞书类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编制技术的现代化,西方近年来出版了大量的辞书等工具书,其中以专科性词典居多。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参考部主任希伊主编的西方最重要的工具书著作《工具书指南》第10篇介绍,该书已收录重要工具书14 000种,主要是二次战后英语国家的出版物,其中尤以美国出版的为主。美国近年来估计每年出版3 500种工具书,当前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

我国自19世纪末叶以来,即开始参照字书、类书体例编辑新体的综合性辞书;本世纪20年代始有从事编辑新体专科词典者。民国教育部曾设有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南京还有杨氏辞典馆,唯成书寥寥。新中国成立以后,主要是近10年以来,我国的辞书事业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00—1949年近50年间,我国仅出版辞书320种;从新中国成立的1949—1979年30年中,全国出版工具书891种;而从1980—1988年短短的9年里,出版工具书竟达3 080种,据悉,现已列入出版社计划、待出版的工具书还有2 700种之多。这一数字说明,随着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的发展,教育、科学、文化的提高,群众迫切希望通过知识密集性强的各类辞书等工具书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更新知识结构,增加知识积累,其中特别是涉及各个知识门类的各种专科词典的大量出版,有效地推动了各有关科学领域知识的普及。

上面介绍关于工具书、辞书,特别是其中的专科词典方面的一般知识,以及历史上和现实中辞书的编纂和出版状况,意在交代清楚:本书即《新编图书情报学辞典》之得以问

世的时代背景。我认为,这是自己承诺为本书撰写序言时所应尽的义务之一。《新编图书情报学辞典》正是在我国各种辞书、尤其是各类专科词典大量出版的新形势下,在图书馆学界、情报学界的广大同行的迫切要求下,经由三十余位编者为之四载的努力而奉献于世的有关图书情报学学科领域的重要辞书、重要专科词典之一,说它是我国时下关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一部新知宝库,这也不算过誉之词。

应当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图书情报学系邵献图、肖东发同志和北京图书馆邢淑贤同志,是这三位学者向我无私的提供资料,使我在此得以能够介绍国外有关图书情报专业方面的辞书编纂和出版的一般状况。

一、美国、西欧图书情报学方面专业辞书编纂、出版情况

1. 《ALA世界图书馆和情报服务大全》,主编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研究院院长韦奇沃思,出版单位为美国图书馆学会,第1版出版于1980年,1986年出第2版。该书系为配合《ALA年鉴》而编,内容包括:提供162个国家的图书馆概况,附有统计数字和图片,介绍不同类型的图书情报服务机构;探讨图书馆学的原则和实践,研究有关图书馆学教育问题;分析为不同读者服务的基本程序和服务方式;介绍在图书馆应用新技术、新媒介,如计算机、声像资料等;另有专款叙述218名已故的各时期的图书馆界的著名人物。新版共有条目470个。

2. 《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百科全书》,美国宾州匹兹堡大学图书馆、情报科学研究院与知识利用系统中心肯特等人编著,马赛尔·德克公司出版。从1968年至1983年间,该书

已出版 35 卷, 其宗旨与《ALA 世界图书馆和情报服务大全》基本相同。内容主要是论述世界各国图书馆和情报系统方面各类机构(包括各自的历史与现状), 介绍图书馆学各个领域的情况, 阐述图书馆学和情报科学方面的理论与实际方面的各种问题, 从应用的角度也介绍了一些技术和方法, 并对这一领域内已故著名人物也略作介绍。书中条目按字母顺序排列, 每一条目后附有参考书目。

3. 《美国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学和情报学词汇》, 该书是国外同类词典中的重要著作, 收入了图书馆学、情报学、书目、印刷出版、书画刻印艺术、计算机科学、通讯网络、缩微制图和复印技术、教育术语、管理科学和档案管理等领域条目共约 4 900 条, 其中图书馆学方面的有编目、主题、分类、索引和文摘等名词术语。

4. 《哈罗德图书馆业务常用词汇》, 该书的出版年代很早, 具有英国渊源, 初版于 1939 年, 仅 176 页, 原为供图书馆学专业考试而编; 之后, 1959、1971、1977 年再版。该书一般按照英国习惯给出定义, 但增加了某些美国词汇和按美国习惯释文。全书约收 7 700 个条目。该书亦为图书馆学标准词典之一, 涉及印刷出版、档案、情报学、通讯技术和自动化等领域。释文较长, 体例在百科全书与词典之间。

5. 《书业词汇》, 为英美同类工具书之权威著作。初版于 1925 年, 收录流行于美国的关于图书出版、发行、古籍贸易和图书馆学词汇共 1 800 个。该书实用性强, 与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编的《书业词汇》体例相近。

6. 《国际图书馆学、情报学和计算机科学首字母指南》, 收录图书馆学、情报学和计算机学协会及其经常使用的词汇的首字母, 会议名称和专门术语、书刊、磁带的首字

母, 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中的词汇首字母, 商业机构、联合企业以及研究和实验项目名称的首字母共 5 500 个, 不仅列出首字母的全称, 并有简单的释文, 如地址和宗旨等。

7. 《图书馆学百科全书》(第三修订版), 以百科全书形式出现, 按条目字顺排列, 每一条目均有简单的定义和详细的解释。一些著名的专业图书馆员、印刷工作者以及其他有关人员的简历也包括在内, 还使用了必要的参照法, 有一百多位专家参与了编写工作。

8. 《图书馆、情报、计算机科学国际缩写指南》, 该书大约包括 5 500 个图书馆、情报、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国际缩写。

以上所列仅为美国、西欧有关图书情报学辞书中的荦荦大端者, 此外美国还有《图书馆学现状》(1960—1961), 《图书馆与教育工程词典》(1983), 《俄英图书馆学词汇》(1966), 《图书词汇》(1979); 西德有《图书馆学词典》(1974—1975), 《图书馆学手册》(1950—1965), 《英德—德英图书馆词汇》(1952), 《图书学词典》(1952—1956), 《德英法图书学专业词典》(1954); 其他国家有《图书馆学 22 种语文实用词汇》(1977), 《英法德西俄图书馆学词汇》(1962), 《图书馆学、情报和文献字典》(1973) 等等。

二、日本图书情报学方面专业辞书编纂、出版情况

1. 植村长三郎著《图书、图书馆事典》, 东京文德社 1951 年出版。

2. 间官不二雄编《图书馆大辞典》, 1952 年出版。

3. 日本文部省编《学术用语集—图书馆编》, 东京日

本图书株式会社, 1959年出版。全书为图书馆学全部常用名词, 分日英文和英日文两部分, 前者第三行为英文排列对照, 后者第三行为拉丁文排列对照。

4. 植村长三郎编著《图书馆学、杂志学辞典》, 东京有朋堂1972年再版。

5. 日本图书馆协会用语委员会编《图书馆用语集》, 1978年出预备版, 1988年1月出版, 全书共396页, 内容由序、目次、用语(包括有16个图表)、附录、西文索引几个部分构成, 用语部分收录有780条用语, 其中70%以上的条目是图书馆范围之内的, 如管理、资料、采购、分类、索引、文摘、流通、参考、保存等方面用语, 其余部分是书目、出版、印刷、文献、情报等方面的用语。该书是一部以图书馆学为中心内容的辞典式工具书。

6. 纪田顺一郎著《图书馆活用辞典》, 东京新潮社1981年出版。

7. 图书馆问题研究会编(清水正之、久保辉二监修)《图书馆用语辞典》, 东京角川书店1982年出版, 共收录图书馆用语2700余条。

8. 波边正玄著《图书、图书馆用语集成》, 大阪近畿大学印刷局1983年出版。

9. 田边広等编《情报图书馆学用语辞典》, 东京雄彬堂1984年出版。

10. 《图书馆情报学手册》, 由日本该书编辑委员会编, 日本丸善出版社1988年出版, 共1322页, 该书由日本图书情报界著名人士裏田武夫等5人组成编委会, 执笔者有日本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各方面专家学者100多人, 包括了最新的情报科学成果和传统的图书馆学的新展开, 它在形式

上不同于用语辞典，对概念都有知识性的分析说明，它一经出版，在日本立即被认为在质量方面是超群的，是迄今为止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小百科辞典。被称之为当今日本有关图书情报工作方面的最大的一部工具书。

三、苏联、东欧图书情报学方面专业辞书编纂、出版情况

较早的有柳·波·哈芙金娜编的《图书馆学术语词典》，1952年版；《英俄图书学字典》，1958年版，该字典包括11 000个图书馆学常用术语和词汇，英文图书馆学文献中常见的缩写字，参考表和一些主要术语图解；《简明保俄和俄保图书馆术语辞典》，1955年版，该书包括千余条图书馆学、目录学术语和一些有关出版与印刷业术语；1969年出版了《俄英书业词典》；1982年出版了《图书学百科词典》等。

还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和苏联图书情报界的同行间已就两国学者联合编纂、出版本专业的辞书问题有了共识。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辛希孟同志访苏归国后向我介绍，根据1988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与苏联科学院自然科学图书馆合作协议，两馆决定自1989年起，共同编辑《汉俄、俄汉图书馆学辞典》。该辞典在内容上将侧重于科技、专业图书馆业务上常用的词条。据悉，联合编写组已正式成立，并就该辞典编写计划和凡例以及出版发行事宜进行了反复协商和研讨，该辞典计划于1991年下半年完稿，1992年出书。

四、中国图书情报学方面专业辞书编译、出版情况

80年代，主要是1982年前后，我国图书情报界开始以编

辑出版的方式较多地引进国外有关的专业辞书。比如:

1. 姜继编《英汉图书情报学词汇》，福建省图书馆1980年出版。

2. 《英汉情报图书工作词汇》，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重庆分所编，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82年出版。为便于读者阅读和翻译情报学与图书馆学方面的英文文献，编者参考国内外有关词典和书刊，编成此书，共收录名词术语19 000余条，书末附有情报与图书馆书刊中最常见的英文缩略词370余条。

3. 周智佑编译的《文献与情报工作词典》，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2年出版。该书是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6年出版的版本编辑的，共收词1 200条，加上同义词共约1 600个。

4. 《汉俄英情报学词典》，(苏)日丹诺娃等编著、王喜等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2年出版。该书共收词汇3 035条，其中基本词汇2 640条，每条均有汉译名、英文原名、定义或解释，包括情报学、图书馆学、目录学等方面内容。书后附有汉、俄、英词条索引和俄英常用简称1 193条。

5. 张蕴珊、许邦兴、王恩光编《英汉图书馆学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收选有图书馆学、情报学等术语词汇共5 000余条，词目除英汉对译外，对于难懂的条目以及国外图书情报工作的概况等方面的内容也均加以注释。据北京大学图书情报学系邵献图、肖东发两位同志向我介绍，该书主要是以英国《哈罗德图书馆业务常用词汇》一书为蓝本，根据该书第4版摘编的。

6. 刘子亚、陆宗诚主编《英汉图书情报文献学词汇》，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出版。

7. 田苍林等编《英汉图书情报缩略语词典》，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年出版。

此外，我国台湾还出版有李德竹编著《图书馆学暨资讯科学用语字汇》，台湾新竹枫城出版社1981年出版，资讯科学在我国台湾系指情报学的习惯用语，该书收图书馆学、情报学常用字汇5480条，对诸条内容未加解释，仅是中英文词义的对照，对从事翻译图书馆学、情报学工作者，有某种帮助作用。

我国自行编纂、出版的图书情报学方面的专业辞书首推卢震京所编《图书学大辞典》。该书定稿于1933年1月，编者为进行搜集、整理、编纂、校勘工作费了几年之力；稿成之后，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因抗战开始，商务印书馆将原稿带到香港，筹划了两年，才在1940年于香港出版。该书虽然未名之为图书馆学专科词典，但在实际上则完全可以作为图书馆学专科词典来使用。它搜辑有关图书的各方面知识，如图书馆学、目录学、版本学、校仇学以及与图书有关的印刷、装订、出版、发行事业等术语、名词、理论、方法，以及历史源流、人物传记等等事项，以供读者检查参考。因之，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刘国钧教授说：“卢震京先生在抗战以前编写了一部图书学大辞典。这是我国在图书馆学、目录学词典方面唯一的著作。”（引自卢震京编，刘国钧、李小缘合校《图书馆学辞典》校后记，商务印书馆1958年）

《图书学大辞典》直到70年代还由我国台湾商务印书馆重印，可见其学术价值和生命力。

新中国成立后，图书馆界对本行的专业辞书需要日益迫切，纷纷建议卢震京能将《图书学大辞典》原版重印，但卢震京“觉得这部书内容不完备的地方很多，而且从现在看

来，其中一部分材料因‘事过境迁’早失时效，另一部分则需加以修改。更严重的，本书编辑于解放以前，在思想观点立场上有很多错误的地方。加之，解放后新的资料，新的情况都应该列入。苏联图书馆学著作也日益输入我国，更不能有所遗漏。如果将旧书重印对于读者用处不大，因此，获得商务印书馆同意，决定将原书加以较大的修订。”（见《图书馆学辞典》前言）这就是卢震京编，刘国钧、李小缘合校的《图书馆学辞典》1958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的主旨。按照该书编校者的计划，修订后拟分三册出版，包括《图书馆学辞典》、《目录学辞典》、《书史学辞典》三种，各以专书形式出版，合起来仍可为一部图书学辞典。遗憾的是，编者仅仅在1958年出版了《图书馆学辞典》后，就被当时不可抵制的“左”倾路线影响下的政治形势、被所谓针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学术批判运动所打断，致使其他两书始终未能问世。

事实是，就在《图书馆学辞典》刚刚出版后，我国图书馆界重要的学术刊物《图书馆学通讯》即于1959年第1期辟出专栏，题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图书馆学和目录学》，集中火力地发表了四篇声讨该书的文章：“《图书馆学辞典》是我国图书馆界的一株毒草”、“《图书馆学辞典》是一部有毒害的书”、“一部推销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图书馆学辞典”、“应该彻底检查批判和重新审改这一重要的工具书”。与此同时，我国另一重要的学术刊物《读书》杂志1959年第1期也发表了题为《清除图书馆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评〈图书馆学辞典〉》的来稿综编文章。上述批判文章断言，《图书馆学辞典》“是我国图书馆界的一株毒草，是一个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新旧资料的大汇抄，根本谈不上‘辞典’性的学术著作”；

“作者顽固地坚持其反动的阶级立场和学术观点，假借抄袭‘辞典’之机集中地贩卖了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图书馆学的反动理论。”有的文章还声言：“在这大跃进的时代，一切事业都在破资产阶级思想、立无产阶级思想，拔白旗、插红旗，以一天等于20年的速度向前发展着。我们在图书馆学领域内，也必须首先要政治挂帅，批判一切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应该彻底地检查、批判和重新审改这一重要的工具书，以符合于广大图书馆工作者的愿望与要求！”显然，当时我国图书出版界和图书馆界的主要刊物发动这种声势颇大的批判运动，就是要将《图书馆学辞典》当作“白旗”从图书馆学学术领域里连根拔掉，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我国图书馆学界此后20多年间无人再敢言本专业的辞书、再也不敢编本专业的词典的局面，因为《图书馆学辞典》正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第一部试图引进新思潮、特别是当时苏联图书馆学的新观点，并注意继承我国已有成果而编纂出版的图书馆学方面的专科词典。

现在看来，《图书馆学辞典》作为对《图书学大辞典》的修订，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是大大地前进一步，当然，它也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诚如刘国钧教授在该辞典校后记中所说：“正是由于博采兼收，就成为‘新旧并列，中外杂揉’。许多旧时代的言论以及由资本主义国家翻译过来的材料无批判地保留了下来，这就必然使得某些概念的解释带有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内容。这是不应该的。虽然书中这部分材料本是解放前旧著，一时无法进行全部批判，但这就使得本书成为客观主义的资料集，不能不说是本书最大的缺点。”从编者卢震京不同意《图书学大辞典》原书原样地出版，力求

增加新内容、对原书加以较大的修订这种良好愿望来看，从校审者刘国钧上述这种言之不可谓之轻、责之不可谓之不重的清醒剖析的话语来看，从编校者修订后的《图书馆学辞典》的实际内容来看，《图书馆学辞典》无论还存在着怎样的缺点和不足，我们都应该对它加以肯定，它毕竟是在《图书学大辞典》基础上的一种提高，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二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部为图书馆界、为企图研究图书馆学的读者提供的一种专门性的词典。它不应受到不公平的指责，而应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公允的评价，它在我国图书馆学发展史上所起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从图书馆学领域为我国辞书事业所做的贡献，应该得到足够的估计。

写到这里，我还要以十分内疚的心情对自己青年时代的治学经历进行反思。发表在《图书馆学通讯》1959年第1期上那篇《“图书馆学辞典”是我国图书馆界的一株毒草》文章，署名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57年级‘图书馆学辞典’批判小组”，这是按着系总支的指示，并组织当时我们班级10余名年青的同学集体去写的大批判稿，我也是其中的撰文者之一；我们这些考入北京大学一年左右的青年学生，响应党的号召，以天真的热情不分青红皂白地投入了“革命大批判”，自以为是“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在学术问题上恰恰违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同学中没有谁去认真地研读原著，只是看上面的颜色行事，人云亦云，不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任意拾来一顶顶耸人听闻的政治帽子和“左”的名词，强加在《图书馆学辞典》这一部具有学术性的专业工具书上，确实是做了一件令图书馆学界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以后随着我们这些青年同学年龄的增长，特别是我自己因为在中学时代写的文

艺杂文也被拿出来当作“右派文章”加以批判，使我以及一些和我谈得来的同学，越来越觉得是确实做了一件不该那么做的蠢事，心中油然升起对卢震京、刘国钧诸位先生的同情与尊敬之感。因为直到1980年刘先生逝世前我还同他时有接触，每当我以十分遗憾的心情谈到此事时，他都表示谅解，说：“当时你们年青，即使我，也真认为此书犯了‘天条’，这是历史的误会，不再谈它了！”然后一笑置之。对卢震京先生，我们素昧平生，从有关传记材料中得知，他是一位于我国图书馆界有相当贡献的学者。他生于1906年，南京市人，早年毕业于私立金陵大学，获文学士学位。求学时代，他曾加入图书馆协会，后加入中华图书馆协会为会员。历任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图书馆主任、立法院统计处编目主任、国民政府文官处图书馆主任、行政院图书馆专员等，毕生致力于图书馆事业，著述甚多，而《图书学大辞典》、《图书馆学辞典》是他的代表作，他前后近20年间以个人力量相继编成这两部专业性辞典，完成了如此艰巨的学术性工作，一直填补着我们专业从40年代到70年代辞书领域在我国的空白，为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所作的贡献是功不可没而又永远值得纪念的。我的学友辛希孟同志告知我，卢先生早在“文革”期间病逝于他所任职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我终未能在先生生前能与他谋面，实为憾事，仅借此序补记往事，以纪念长眠于九泉下的这位开拓我国图书馆学辞书的前辈学者。

我国图书情报学方面的专业词典在《图书馆学辞典》横遭指责、批判，冷清了20余年之后，直至80年代才开始出现了转机。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适应图书情报界广大读者迫切需要专业知识的局面，先是有具有辞书性的小册子出版。如李纪有等编《图书馆专业基本科目名词简释》，北京书目文